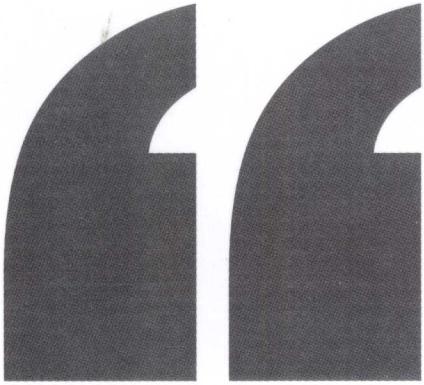


Introduction à la médiologie



新闻传播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媒介学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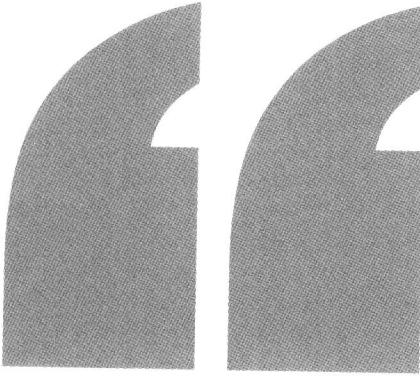
[法] 雷吉斯·德布雷 (Régis DEBRAY) 著

刘文玲 译

陈卫星 审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Introductuuu à la médiologie

新闻传播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媒介学引论

[法] 雷吉斯·德布雷 (Régis DEBRAY) 著

刘文玲 译

陈卫星 审译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学引论/(法)德布雷著;刘文玲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11

(新闻传播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书名原文:Introduction à la médiologie

ISBN 978—7—5657—0836—7

I. ①媒… II. ①德… ②刘…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 IV. ①G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2848 号

Copyright © 2000 by PUF

ISBN 2 13 050105 2

本书法文版曾于 2000 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PUF,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出版。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版权由法国大学出版社授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在全球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3—6679 号

媒介学引论

作 者 [法]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

译 者 刘文玲

审 译 陈卫星

责任编辑 张 旭 张 玥

策划编辑 李水仙

特约编辑 崔 超

封面设计 魏 东

出版监制 张 玥

出版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4.5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57—0836—7/G · 0836 定价 52.00 元

中文版序

如何在保留自己特色的同时进行转变？在全球前所未有的物质均一化的浪潮当中，一个民族如何能够保留并保护好自己的文化特性呢？如何在坚持自己的精神道德遗产的同时又能同现代技术完美地结合起来呢？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入 21 世纪初提出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跃进式的超凡发展尤其突出。这是一本典型的教科书，为法国研究媒介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理论基础。刘文玲博士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旨在明确阐述这些问题和讨论，并希望通过这本书为这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提供一点思考线索。

媒介学不是一门理论科学，而只是一种工具。媒介学没有觊觎科学头衔，进入所谓的“人文社会科学”席列当中。这只是一个正在组建的研究领域。它的出发点是研究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旨在明晰传承（transmission）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媒介学中所说的传承指的是时间上的价值与知识在代与代之间的传送。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法国也没有摆脱这样的焦虑，就是应该从过去历史中提取什么东西才能够面对未来？这个问题关系到法国的教育体系，尤其关系到历史的教育问题。中国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发现，当今的时间缩短到此时此刻，数据数字化要求使用统一的信息语言，麦当劳、迪士尼乐园、哈利·波特充斥着所有少年的想象，无个性极具破坏性的城市规划像压缩机的滚筒一般无情地摧毁着建筑遗产和自然风景。

技术产品和技术规范使整个世界形成了标准化：它们生产出来的是同样的产品，并不断地重新复制（所有的机器都是一样的）。而语言和文化会产生区别标准，正是这些区别形成了每个文明的特色和风格：因为是语言和文化

创造了别人无法模拟的独特的东西（比如书写文字、饮食以及绘画艺术等）。在这两种发展变化趋势中存在着一种张力：因为任何一种趋势都不能跨越另一种趋势而独立发展，从而每一种趋势都可以抑制它的反面和补充面。一种文化原则上说是一种长期的记忆，而技术却是为了维持短暂的时间。艺术、回忆以及日历上的节日是同一方乡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的电脑和集装箱却通往四面八方。

我们不应该对技术产生畏惧情绪：因为所有的文化都不是天定而成的，它只是一个模具，这个模具需要仪器设备，需要手工业者，需要技术知识才能形成。但是也不要盲目地崇拜技术，幼稚地去崇拜市场上出现的最新的小玩意。那些迷恋机器现代性的人很快就会受到全球化的束缚，从而会因为商品而牺牲了自己的个性和记忆。传统主义守旧落后，畏缩不前，会使文化闭关自守；而现代主义会忘记回忆，见异思迁，面向所有的潮流而丢失了使我们彼此互不相同的最为宝贵的东西。所以应该在这两者之间选一条中间道路，寻找一个平衡点。机械社会成倍地生产可以互换的东西；只有活着的生物才可以生产出独特的个体，并不断地更新。

在此，希望本书中对人类现象的分析能够在对保持并不断更新中国丰富的独特性的思考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雷吉斯·德布雷
2012年4月于巴黎

目 录

中文版序	/1
第一章 传承的时代	
• 观察点	/1
传承：不仅仅是传播	/3
研究领域的拓展	/11
人类的特性	/15
纪念物的优先性	/24
第二章 “中介即信息”	
• 方法论	/33
对“中介即信息”的研究	/35
研究的第一步：媒介圈(médiasphère)	/45
如何认识技术和/或文化	/53
艺术见证	/62
第三章 “这个将毁灭那个”	
• 目标：关系，而非物体	/71
这个和那个之间：打开指南针	/73
决定论的问题：中介与中间领域	/89
未来的先驱者	/102

第四章 象征符号的有效性

• 研究路线:从媒介到调解作用	/109
“话语的力量”:尘封的黑匣子	/111
起始约定:神灵化身论	/122
中介的双重身份	/128

第五章 学科建议

• 计划:辅助性科目	/141
媒介学的接纳中心	/143
为什么媒介学不是符号学	/143
为什么媒介学不是心理学	/149
为什么媒介学不是社会学	/152
为什么我们不是(或不仅仅是)语用学者	/156
为什么我们不是(不全是或还不全是)历史学家	/158
技术的无意识性,坚持与自我克制	/161
还有一座要推倒的墙	/172

第六章 媒介学做什么

• 目的:平息学科竞争	/183
既不是科学也不是灵丹妙药	/185
技术/种族:危险的领域	/192
“高科技”的先知主义还是过激的逻辑	/197
慢跑效应(L'effet-jogging)	/201
走向技术伦理	/208

参考文献

基本参考文献	/217
--------	------

参考文献	/225
------	------

第一章

传承的时代

· 观察点

传承：不仅仅是传播

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生物学研究的对象，就如同一条切线和平面都是几何学的范畴，空气现象都是气象学的范畴一样。如果按照这种方法来看的话，我们说定义一门学科是由它的研究对象来决定的，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说：“媒介学就是研究媒体的学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定义方法就是对这一学科最大的蔑视。因为，技术史学家奥德里库尔^①曾经说过：“事实上，表现一种科学特征的是观点，而不是研究对象。比如说，一张桌子，以物理学的观点来看，人们可以研究它的重量、密度、抗压强度；从化学的角度看，可以分析它对火的燃烧性，或者是酸的溶解性；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可以分析作为木材的树木的年龄和种类；从人类科学的角度看，我们甚至可以分析桌子的来源及其对人类的用途。”^②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人类科学”所涉及的宽阔领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每一门科学都是沿着特定的

^① 奥德里库尔（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 1911—1996），法国语言学家、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从事农业技术历史的研究。——译者注

^② 奥德里库尔：《技术、人类科学》（*La technologie, science humaine*），巴黎，人文出版社，1987年。

入射角进入人类生活当中的。在时间的长河中，每个个体又根据不同的射入截面获取各种身份特征。每一门学科在人类学领域中，甚至以人类学为基础描绘出一张鲜明而又独特的形象，一个全新的参照物。人是完整的唯一的个体，但是这种确确实实的客观性“分科”[这是全国大学顾问委员会（CNU）分科时使用的术语]每一次都会从一个完整的人身上抽取不同的学科主题，因为理论性的研究工作，从其用途或目的性来说，是同实际相分离的。经过两个世纪的努力，我们对人类已经有足够的了解，人会说话（语言学），有欲望（心理学），会生产（经济学），习惯群居（社会学），懂得思考规划（认识论），统治与被统治（政治学），学习和教育（教育学），等等。那么，媒介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它不仅包括我们所说的“传播”（communication），而且媒介学更加注重的是懂得传承的人（l'homme qui transmet）。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一研究对象，并不比其他研究对象容易得多，因此，我们应该在概念上做出比以往的观念更多的努力，寻找出一种新颖独特的方法。

这里所说的新颖独特的方法并不是指稀奇古怪、排斥异己的方法。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传承所提出的对人类事实的观察角度，既不可能详尽无遗，将他所有行为比如说话、愿望、工作等的附带现象都视为原始本质，也不要断章取义，只强调某种特征而不进行交叉综合分析。同一个事实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进行研究，既要有区别又要兼容性。比如说，人类语言可以被当作一种传播工具（moyen de communication），一种使对话双方互相沟通理解的交流工具来分析研究。同时，人类语言也具有传承功能（fonction de transmission），而这种传承功能就是由书写符号（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汉字、韩文字母等）所承担的，通过这种形式，浓缩了一个群体的集体历史记忆，经历时光的泯灭，它依旧能够使一种共有的“基本的个性”在拥有这种母语的使用者当中经久流传。我们说，母语是一种具有实在意义的系统，它使得特定的活着的群体感受到同那些逝者是属于同一个群体。当我们把语言当作一种传播工具来研究的时候，其实是以一种同步的方式来研究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当我们把语言当作一种具有传承功能的工具来研究的时候，那是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来研究代与代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我们面对

的对象始终是同一种语言。

我们今天所说的“传播”一词经历了一段丰富多彩的历史（我们在后面会解释）。而“传承”（transmettre）这个领域并不是仅凭我们肉眼就可以观察到的。像所有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不能仅凭经验就直接了解这个词，我们必须超越“传播”（communiquer）这个领域的概念来理解它。“传承”和“传播”两者的概念十分相近，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给我们的认识造成“障碍”。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会和运用超越的方法来看待问题，这样才能在一个复杂的整体中形成一个完整的形式。传播是长期过程中的瞬间（moment）和广泛集合体中的片断（fragment）。而这个广泛的集合体，我们将称之为传承（transmission）。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通常一门学科的划分，往往在开始的时候，都会明确所使用术语的定义。

在“传承”这一术语语境中，包括所有表现集体记忆的词语；而在“传播”这一术语语境中，则表现的是一定时间内的信息流通。为避免对立，换一种说法，传播是在空间中传递信息，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时空范围内进行。而传承指的是在时间中传递信息，确切地说，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传播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它是以个体之间的心理学研究作为出发点（在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以话语行为所构成的基本经验为基础）。传承是属于历史范畴，它是以技术性能为出发点（即通过媒介载体的使用）。一方面，将这里和那里连接起来，形成网络（也就是社会）；另一方面，将以前的和现在的连接起来，形成延续性（也就是说文化的延续性）。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可能不关注有关传播的问题、媒体的功能以及它们的影响。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也不能不考虑因代代相传而积累下来的成果或者是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或遭到破坏的东西。代代相传就组成了代与代之间的一个链条，而我们所说的这个链条是通过那些熟悉的概念有机地重新组建起来的，由星云状态转变成分散状态。从而，在链条的每个截面上，产生不同的邻近关系或亲缘关系（会谈和阅读）。

传承与传播的这些区别也许看起来是我们人为随意确定下来的。但是，我们只是想让人认识到一点，就是如果要传承的话，首先必须要有传播。如果

拿撒勒人耶稣事先没有同周围的人交往，没有同他的弟子们谈话，没有面对人群的责问，基督教教会将永远不会确保福音教义传遍整个世纪、整个大陆，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两个现象，即使它们看起来像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我们以后会解释为什么出现这种明显性），却仍然存在着某种连续性的解决办法。它们需要一些跨学科的但却不能混为一谈的概念性工具来解释，以便人们更加清楚明白。

同样，存在另一种错误认识，就是混淆了传承/传播的二元性和公开扩散/个体交流（通常指电话对话或者书信往来）的二元性关系。具体地说，要想取得传承现象，仅仅拉长发射器和接收器的连线，增强网络的多向性，或是使传播渠道工业化，比如印刷、广播、电视等这些手段是不够的。事实恰恰相反。衡量传播现象的标准不应当是看人与人之间是否有机械化的接口，而是看是否有制度化的接口。借用皮埃尔·舍费尔^①的说法，就是传播机器（电报、电视、电脑），如今这样的机器会越来越多。然而，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传承机器。传承是被机体理想化了的（optimisée par un corps）个人或团体之间的传播。这里我们取了“机体（corps）”的双重定义，一是指个人的躯体，一是指全体成员的机构组织。如果传播是即时的、直接的、极其容易传递的话，那么，传承既不是即时的也不是客观普遍化的、无个性的。它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父子关系、师生关系、传教士与信徒之间的关系、师徒关系等等），从技术上说是配套的，但是，技术接口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说存在瞬间的传播行为的话，那么传承一直是一个过程。因为传统跟繁殖有关，跟在大大小小的社会中的生物事实有关，所以传承往往从教育开始，而且从未停止。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具有义务性、等级性，并在特定的阶段、特定的层次中具有一定的规程，就像我们看到在某些机构中存在着现有成员推选或指定新成员一样，来推选或产生新的弟子、成员等等。

看到前人的工作成果和影响被后人所继承，这是人类（包括其他物种）

^① 皮埃尔·舍费尔（Pierre Schaeffer, 1910—1995），法国工程师、作家，是具体音乐和电子音乐的先驱。——译者注

最大的胜利。人类只有在那些可持续的工作基础上才能慢慢崛起。

——保尔·瓦莱里，《破碎的历史》

“坚持”也好，开辟新的期限也好，如果没有经过放弃或是痛苦，都是无法前进的。不存在没有约束性机制的思想体系，而这约束性机制就是一个机构发展和世代相传的导线。而机构应该是被当作一个系统机器（appareil génalogique）来看待。这包含了双重意思：一是心理机器，从精神上连接个体同他所属的群体，这也许会引起神经官能症；一是司法机器，确立法律规定，决定所属关系，这也许会引起权力滥用现象。思想、信仰和知识的长期性不可能超越社会尺度，在这里，社会的作用不仅仅是可靠的保证，而且是“情感的调音器”〔让·古约塔^①〕。群体的亲属关系相互连接往往需要一个能够想象的可以辨认的地方（比如教会、党派、家庭、企业等等），由个人来承担讲述一段历史神话或者历史故事（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家族故事），人们不承认这样的谱系传统。所以，只有通过一个可以想象的视为同一的地方才能使各种价值的合法性和内容的有效性同传播者的忠诚与真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通过传播技术手段来保证文化传承，这一观点构成了“社会”的一个极为典型的错觉。我们这里所说的，“传播社会”（la société de communication）的特点就是在征服空间上具有越来越完备的现代性，而在时间掌握上却越来越衰弱（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考虑一个时代是否能够同时驯服时间和空间，或者是文化对时间和空间是否有优先选择权）。我们暂且不考虑这个哲学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热衷于传播的客观原因。当然，热潮之后的不适也会随之而来。打个比方，就好比是一个人喝醉了酒，当时除了飘飘欲仙的快感以外，是没有其他感觉的。只有在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头疼。无论是为了祛除传播的神秘色彩还是为了激起它更大的潜力，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归根到底，信息的大量爆发使我们过分迷恋传播工具。我们开始对大量的机器着迷，厌倦了我们的机构等级，尤其是机器在不断更新，而我们的机构体系多多少少是以恒定的速度不断重复再造。

^① 让·古约塔（Jean Guyotat），法国心理学家。——译者注

为了超越空间，一部大型机器足矣。然而，为了超越时间，却需要移动机器和一部发动机，或者是一部具体的机器（如字母书写）和一个社会机构（比如学校、书籍文化载体，甚至是以后的保护工具等）。因为快速更新的传播工业在速度上战胜了缓慢的传承机构，新的网络地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稳定的链条已被降到次要的位置，因为它缺乏连续的创造性。大众媒体无处不在，俨然变成全球性的了，而中介多多少少跟不上历史的脚步，从而丧失了社会地位。大众媒体对处理这里和那里的关系比处理以前和以后的关系更加敏感更加明显。正是这个原因，公共思想自然会更容易接受空间的治理利用，而不是时间的治理利用。我们多次阐明，我们的领土扩大了，日程表缩短了，视野退后了，时间的深度变得模糊。我们上互联网比看编年史更容易。换句话说，当全球的人都能够同时看到世界杯电视现场直播的时候，拉辛及《耶稣受难》对法国学生来说就好像是死的文字（因为语言发展的历时性）。共享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感受共同的历史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可移动的领域越来越大，而历史意识领域却越来越小；技术联结越来越强，象征性的联结却越来越弱：许多差别各异的传播方式和传承方式在岛屿和大陆之间叫嚣着，技术从原来纯粹的运载设备迅速发展到象征性的材料载体，技术的这种迅速发展在材料和机构，即精工细作的材料 MO (*matière ouvragée*) 和物质化的组织 OM (*organisation matérialisée*) 之间产生某种不平衡。我们可以在整体和部分的转化中，或者在永恒和昙花一现的从属关系中，看到人类真正文明危机的信号，这就是传承危机的正式说法。而我们目前看到的学校教学大纲正受到电视节目的冲击，出现不稳定的状况，就是传承危机的症状和信号。

我们举一个感性的例子：图书馆。听到这个词，我们就会想到一些书写符号以成册或成卷的印刷形式被保存在一个专门的建筑物当中，以供查询。这种物理性的集中构成了记忆保存，这就是以外部形式来进行内在的传承。这种死气沉沉的贮藏所不仅仅是为了保存几个世纪以来的遗产，而且是利用它的存在，根据它自身的习惯（注解、翻译、编辑等），为文人提供模板，从而促进新书、新的出版物的出现。一座图书馆孕育出许多作家，就如同电影

博物馆孕育出导演一样。追溯历史，这类场所是由国家政权建立的，确切地说，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建立的。文人的世界不是自给自足的（*translatio imperii et studii*）。一些大型的图书馆往往是通过地名来反映一个伟大的名字，比如说亚历山大图书馆来源于亚历山大大帝。在荷马（后来他的诗集被称为荷马史诗）的背后有庇西特拉图，在孔子的背后是中国汉族人。在帕伽马图书馆背后，是阿塔罗斯王朝的统治；在巴格达图书馆背后，是曼苏尔的统治；而法国的国家图书馆叫弗朗西斯·密特朗图书馆。没有一座图书馆没有经历过或正在受皇权、哈里发、王侯、议会，或者总统、学院、军队、大学的保护。学者的社会性无论是由图书馆诱导出来的还是生产出来的，都无法蒙蔽图书馆这种工具的制度谱系，它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的延续和补充，它是在其创立者的庇护下生存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机构：比如亚里士多德中学这样的哲学学校，它是民间私人协会（在古希腊是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又如教会和修道院，学院和大学，学术和文人学院（像复兴时期的学院），它们都是按照规定注册并接受一定的管理。这就是载体的载体（*le support du support*），也就是隐形的传承者。图书馆只是一个可视的介质，而不是动力机器。确切地说，是制度化了的组织将贮存物变成载体，同时也包括它自身的延续（学校、教堂、军队、国家等等）。图书馆对机构组织的繁殖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弥补术，但是运载工具在由预先的有机要求调动之前是不会自己发动的。打个比方，就像食品储藏室并不能保证食品的供应一样。书籍的外部记忆只有通过一个群体的内部记忆才能产生力量。记忆库如同建筑物一样，它可以用来保存记忆，以昂贵的价格提升记忆的庄严性，使记忆在书架上或者计算机的软件设备中得到缓解（这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理反常作用，而这种现象就在建筑物上得以表现）。换句话说，如果集体记忆被放置在一些用同一个名字命名的“地方”，那么记忆的这种集体性很快就会患记忆遗失症。我们不要将行为手段与过程、记忆法和记忆性混淆在一起。有一些程序设定人，他们设计建立信息传播网络，使传播网络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他们却没有考虑学习和教授这些程序的先决条件，他们自己反而成了这种混乱概念的受害者。如果一本书没有读者（应该是相反的），或者说一个网络信息库在事实

上没有引发相应的占有容量，那就应该算是一种疏忽，或者是失职。同样的，我们看到，一方面国家教育机关在中学实行改编传统教材，用报刊上的文章来代替传统读物，在学校中建立抽样阅读模式；而另一方面，文化行政部门又为传统读物的数字化提供资金，以便使人们能够更容易获取这些读本，但是，奇怪的是，我们的一些电子阅览室依然空无一人。这不是很不协调吗？的确，这主要是因为其中存在着某种误解或错误的认识。这种错误的认识就在于将信息的物理转移误认为是认知的社会传承，也就是把运输工具当成驱动器。

顺便提一下，这并不是对离我们渐行渐远的人道主义的悲叹，而是一种必要的呼吁，即呼吁政府机构在传承过程中那瞬间性的地位。确切地说，就是为了保留文字记载，在目前的文本和潜在的读者之间必须建立一种载体，就像出版机构和书号的传统分配，信息的筛选和分类一样^①。

同一个问题，我们换一种说法。在信息交流（infocom）这个词上，重点自然是落在媒体（médias）本身上，也就是说，是交流渠道或交流载体的特点。媒介（média）这个词，它的重点是中介行为（médiation，法语中的后缀ion表示动作行为），这同它是一个操作设备分不开的。媒介分析就是授予交流载体一定的职能，使其从属于其功能，比如学校与教育的关系；博物馆与展览的关系；图书馆与阅读的关系；工作室与学徒的关系；研究室与研究的关系；教堂与信仰的关系，等等。增强上述“记忆场所”的活力，但不依靠具有这些记忆的群体，换句话说，就是将居住的人同居住地相分离，将体与魂相分离，这种做法反过来会将建筑物偶像化。记忆不是非物质的空洞的思想，它是物质化的组织体系（我们说，它就是圣教堂），它可以在其最原始的传播中介人（口头传教人）死亡之后继续生存下来，借用所有的资源，即典籍、印刷、广播和屏幕进行宣传，总之，同时代步步相随。

^① 新一代的电子编辑比较有开发潜力，因为从这里重新出现系列丛书、出版商、社团，也就是结构化的媒介总和，综合性的操作系统以及筛选程序。出版商重新出现在数字化的档案中可以使未来的图书馆不再是一个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助航标志的书籍资料海洋的变体。见罗伯特·达沃顿（Robert Darnton）：《书籍的新时代》（*Le nouvel age du livre*），《争鸣》杂志，第105期。